

資本與行動者網路的運作 ——《紅高粱家族》英譯本生產及傳播之 社會學探析

汪寶榮

2012年10月，大陸作家莫言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旋即出現一股對其作品翻譯的討論與研究熱潮，美國漢學家、莫言著作主要英譯者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成為中文媒體和學界關注的熱門人物。莫言代表作之一《紅高粱家族》葛譯本由維京企鵝圖書公司初版於1993年，借張藝謀在海外大獲成功的同名電影《紅高粱》(1988年)之力，迄今發行兩萬餘冊且未絕版，在西方產生較大影響，對莫言獲諾獎貢獻良多。近十年西方翻譯學界出現「社會學轉向」，注重研究翻譯生產過程，即分析各種行為者(或行動者)如何構建網路，合力生產和傳播一個譯本，為我們探討中文文學國際傳播提供了一個合適的理論工具。現有研究多從語料庫、文學或描述翻譯學視角考察葛譯《紅高粱》特點及面貌，運用翻譯社會學探討其生產、傳播過程的尚罕見。本文運用法國學者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和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路理論，分析各種行動者如何透過資本轉化在美國文學場域內進行運作，如何交互、聯結構成行動者網路，順利完成《紅高粱》英譯本在美國的生產和傳播，同時探討該案例對中文文學國際傳播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紅高粱家族、葛浩文、行動者網路理論、場域理論、生產和傳播

收件：2014年2月11日；修改：2014年5月12日；接受：2014年7月3日

汪寶榮，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E-mail: abrwang.cls2011@gmail.com。

本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翻譯社會學視域下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介模式及其運作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4YJA740032)的部分成果。

Capital and Actor Networks: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Mo Yan's *Red Sorghum*

Baorong Wang

Since mainland Chinese writer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October 2012,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f his works in translation. American sinologist Howard Goldblatt, Mo Yan's primary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or, has been the topic of heated discussions in the Chinese media and in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ies. Mo Yan's early masterpiece *Hong Gaoliang Jiazu* (*Red Sorghum*), first published by Viking Penguin in 1993 in Goldblatt's masterful translation, has sold more than 20,000 copies without going out of print, thanks in part to Zhang Yimou's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film (1988) of the same title based on the novel. In fact, Mo Yan's winning of the Nobel Prize owes much to the novel's successful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While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a "sociological turn"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case studies of "translations in the making," we have not see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Red Sorghum*; rather, we have gotten the usual analyses based on literary, corpus-assisted 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rawing on Pierre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nd Bruno Latour's Actor-Network Theory, this article looks at how various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operating in a hypothesized American literary "field"—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 to create pre- and post-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networks leading to the successful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Red Sorghu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uture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the West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Red Sorghum*, Howard Goldblatt, Actor-Network Theory, field theory,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Received: February 11, 2014; Revised: May 12, 2014; Accepted: July 3, 2014

Baorong W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mail: abrwang.cls2011@gmail.com

壹、諾獎引出的翻譯社會學論題

2012年10月，大陸作家莫言因其作品「用虛幻現實主義將傳說、歷史和當代結合起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¹旋即引起中文媒體和學界對其作品外文翻譯的關注和討論。鄭延國（2012）為香港《大公報》撰文，認為莫言獲頒這枚「沉甸甸的軍功章」，「也應該包含有眾多翻譯家們的一份功勞，其中尤以英譯者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最為顯著」。內地資深作家王蒙（2013）則認為，莫言獲諾獎，「關鍵的關鍵仍然是作品」，因為「作品本身不好，翻譯也好不了。」南京大學許鈞教授贊同王蒙觀點之餘指出，瑞典學院評委中只有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 能直接閱讀中文文本，因此評審的依據是莫言作品的外語譯本；「沒有翻譯，中國作家的作品不可能進入諾獎評審的視野，譯者當然功不可沒。」（許方、許鈞，2013）筆者以為，以上觀點都有道理，但是身為翻譯學者的許鈞持論似乎最為方正公允，翻譯對於中文文學走進世界文學殿堂的功用確實不容置疑。由此推知，英語作為當今最重要的國際語言，莫言作品主要英譯者、美國漢學家葛浩文自然居功至偉。葛氏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專事中文小說英譯，迄今翻譯出版大陸、港、臺20多位中文作家50多部作品，被著名文學史家夏志清譽為「公認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1996，頁21）葛浩文 (Sparks, 2013) 透露，在斯德哥爾摩參加頒獎典禮時，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告訴他，他的英文翻譯對於他們評選莫言為2012年度文學獎得主「至關重要」(critical)。確實，自1993年始，葛浩文所譯《紅高粱家族》(*Red Sorghum*, 1993)、《天堂蒜薹之歌》(1995)、《酒國》(2000)、《豐乳肥臀》(2004)、《生死疲勞》(2008)、《檀

¹ 引自《瑞典學院新聞公報》。2012年10月11日。參見http://www.svenskaakademien.se/en/the_nobel_prize_in_literature/laureates/mo_yan。

香刑》(2013)等莫言小說在英語世界陸續出版，² 得到廣泛閱讀和好評，使莫言文名鵲起，影響漸增，在世界文學場域積累了足夠的非經濟資本 (noneconomic capital)，終於助他走上瑞典學院領獎臺。

莫言(2010, 頁153)自稱，《紅高粱家族》(1987年初版，下文簡稱《紅高粱》)不僅是他首部長篇小說，也是他「最有影響的小說」。對葛浩文來說，情形何其相似：*Red Sorghum*不僅是他所譯第一部莫言作品，也是他所譯莫言作品中「銷得最好的」(季進，2009, 頁47)，標誌著翻譯家葛浩文「從此登上事業的高峰」(何琳，2011, 頁164–165)。因此，想要探究葛譯莫言作品成功之道，《紅高粱》是當然之選。

近十年，西方翻譯學出現「社會學轉向」(sociological turn)，逐漸重視翻譯生產過程研究，即著重分析各種行為者(或行動者)如何建構網路，合力生產和傳播一個譯本，為我們探討中文文學國際傳播提供了一個合適的理論工具。不少華語翻譯學者引介、闡發了西方翻譯社會學主要理論和研究成果(如王志弘，2001；李紅滿，2007；邢傑，2007；武光軍，2008)，近幾年則開始出現一些原創性案例研究(如Kung, 2009；陸志國，2013)。據筆者所見，《紅高粱》葛譯研究者大多從語料庫(侯羽、劉澤權、劉鼎甲，2014)、文學(呂敏宏，2011；邵璐，2011)或描述翻譯學(Dong, 2013)視角考察譯本特點和面貌，運用翻譯社會學探討其生產、傳播過程的尚罕見。須指出的是，鄒佳(Yan, 2013)運用布迪厄的「場域」和「慣習」概念，詳細分析了葛浩文的譯者慣習與翻譯場域的交互影響，認為葛氏的慣習即學術興趣和文學偏好驅使他青睞嚴肅文學作品，並導致他在翻譯《紅高粱》時採取「易化策略」。

本文應用法國學者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

² 英譯莫言作品目錄詳見「瑞典學院官網」。參見http://www.svenskaakademien.se/en/the_nobel_prize_in_literature/laureates/mo_yan/bio_ne12en。

(field theory) 和布魯諾·拉圖爾 (Bruno Latour) 等人的行動者網路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 ANT) ，重點分析各種行動者如何透過資本轉化在場域內進行運作，並構成翻譯、出版網路，順利完成葛譯《紅高粱》在美國的生產和傳播，最後嘗試透過該成功案例探討中文文學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徑。

貳、理論框架

近十年，翻譯社會學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這個新興的翻譯研究領域方興未艾。西方翻譯學者逐漸重視對各種行為者（或行動者）如何透過權力關係互動及網路運作，完成一個譯本生產、傳播過程的案例分析 (Wolf, 2010) ，「以克服第一代多元系統翻譯研究往往局限於文本分析，從而造成譯作個性喪失 (to depersonalize the translation) 的缺陷。」 (Buzelin, 2007, p. 142) 比澤蘭 (Buzelin, 2013, p. 187) 指出，目前用於翻譯研究的三種社會學理論中，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獲廣泛應用，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路理論和盧曼 (N. Luhmann) 的社會系統理論 (social systems theory) 應用者則少得多；這些理論框架均用於解釋社會世界，但是對「社會」 (social) 的含義、社會 (societies) 由什麼構成的假定大異其趣，且世界觀和具體研究問題各不相同，因此它們「各有盲點，既相互抵觸又相互充實。」³

場域理論有三個核心概念，即「場域」 (field)、「慣習」 (habitus)、「資本」 (capital) 。場域指「具有自己獨特運作法則的社會空間」 (Bourdieu, 1993, p.162) ，是能起作用的社會個體即行為者 (agent) 之間客觀關係構成的系統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p. 106-107) 。布迪厄認為，社會空間結構可分為哲學、政治、科學、文學場域等，構成一個競爭不斷的「權力場域」 (field of power) ，即具有分配資本和決定社會結

³ 本文所引英文文獻，均由筆者譯成中文；必要時在正文或注釋中註明英文原文。

構能力的結構空間；作家、文學研究者、評論家、文學譯者依附於文學場域，由於其運作法則主要基於文化資本，而權力場域主要依賴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運作，因此前者在後者中處於被支配地位 (Bourdieu, 1993, pp. 37-40)。⁴ 場域既然是行為者之間客觀關係構成的系統，就需要考察社會個體的行為，而個體的行為基於慣習。所謂慣習，是指個體在成長、家庭教育、學習、工作和社交等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學習、內化並強化其所認識的社會規律，從而形成的一套「行為傾向系統」(system of dispositions) (Bourdieu, 1990, p. 54)。換言之，慣習是個體「社會化後的一種主體性」(a socialized subjectivity)(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 126)。個體在場域中透過與其他個體的互動形成慣習，又透過自身慣習對場域施加影響。⁵

個體在社會空間中的地位有高有低，這是由他們在特定場域中擁有的資格決定的，即資格高的占統治地位、維護規則；資格不高的則在場域中被統治、受制於規則。布迪厄借用經濟學概念「資本」，對個體在場域中具有資格進行歸納、分類。布迪厄指出：「資本的運作依賴一個特定場域，且以或多或少昂貴的轉化為代價，而轉化是資本在場域中起作用的先決條件；資本不限於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資本，還可指非物質形式的非經濟資本，包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Bourdieu, 1997, p. 47) 這些資本均可相互轉化，例如經濟資本可轉化為非經濟資本，反之亦然，但是「其他形式的資本都來源於經濟資本」(pp. 47, 53-54)。經濟資本可直接轉換成金錢，「會以產權的形式制度化」；文化資本指個體在社會空間中所受的教育、從事的職業及獲得的文化資

⁴ 由此下推，傳統觀點（可視為代表占支配地位的文學場域）認為，譯作是原作的替代品、衍生物，也即享有的文化資本更少，因此翻譯場域在文學場域中處於被支配地位。

⁵ 西梅奧尼 (Simeoni, 1998) 基於布迪厄的術語，提出「譯者慣習」概念，認為自古到今譯者被「強制屈從」(enforced submission) 於本土文學主流樣式，而不是主動革新。邢傑 (2007: 13) 則認為，譯者慣習須包括翻譯選材、翻譯策略和譯者翻譯觀等。本文借用後者的觀點。

源（如著作）；社會資本指個體在社會中的各種人際關係和社會義務 (p. 47)；符號資本 (symbolic capital, 又稱「象徵資本」) 是指「被象徵性理解的任何一種形式的資本」 (p. 56), 尤指個體在社會空間中享有的「信譽」 (credit) (Bourdieu, 1990, pp. 120)。

最後，正如古安維克 (Gouanic, 2002, p. 99) 所指出：場域、慣習與資本都只是方便我們觀察社會現實的概念工具。也就是說，我們「假定」 (as if) 有一個文學場域，各種文化生產者（包括譯者）在場域裏面爭鬥，想方設法使自己的產品勝過他人的產品，而這種爭鬥又得到從以前的爭鬥中獲得的慣習的支持。

行動者網路理論（略作ANT）創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拉圖爾、米歇爾·卡隆 (Michel Callon) 和約翰·勞 (John Law) 為主要奠基者 (Crawford, 2005, p. 1)。該理論內容龐雜，本文重點引介「行動者」 (actor) 和「網路」 (network) 這兩個核心概念。拉圖爾等人認為，以往的社會科學多以人類為中心，將「自然」與「社會」、「人類」與「非人類」 (non-human) 二元對立，不適合用來分析社會世界，因為社會世界中還有機器、動物、文本、混合物 (hybrids) 等非人類 (Murdoch, 1997)。也就是說，所有參與知識生產 (science in the making) 的行動者，無論其是否為人類，都應視為同等對待的研究對象。拉圖爾指出，「行動者」一詞不僅指人類行動者 (human actors)，也包括觀念、技術、生物等非人類的物體 (objects)；總之，「任何透過製造差異確實改變了事態的東西都是行動者」 (Latour, 2005, p. 71)。卡隆解釋：ANT所指行動者具有未限定性 (indeterminacy)，「可能是一種招募 (enroll)、支配其他行動者的權力，或是一個沒有主動權、只好聽憑招募的行為人」 (Callon, 1999, p. 181)；ANT不是研究行動者的理論，而是更多關注行動者聯結而成的「關係網絡」 (network of relations)。此處的「網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網路或技術網路，因此ANT不是研究社會網路的理論。拉圖爾強調：「我們從未想過創立一種關於社會由什麼構成的理論 (theory)，ANT只是遵循民

族方法學 (ethnomethodology) 途徑的另一種 (分析社會世界的) 方法」 (Latour, 1999, p. 19)。行動者網路是由諸多不同的、互動的行動者通過異質工程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 構建的關係網；行動者的行動使得異質因素形成網路，而網路能夠重新定義或轉變其構成因素 (Law, 1987, pp. 113-114)。卡隆指出：ANT之所以強調網路的重要性，是因為無論個體有多強，單個行動者不可能獨自完成一項行動，而是需要從網路中其他行動者那裡獲得能量，共同完成該項行動 (Callon, 1999, p. 182)。行動者和網路相互建構，網路由各種行動者構成，但是沒有網路行動者就無法行動。

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可用來解釋行為者（如譯者）如何在場域中形成慣習，如何本著慣習，透過發起或參與翻譯生產、傳播計畫，在文學場域中積累資本、獲取利益，從而對場域施加影響。但是，該理論涵蓋的行為者限於作者、譯者、出版商、讀者等人類行動者，未考慮文本、影視作品、技術、觀念等非人類行動者，且未能清晰界定行為者構成的關係網絡。場域理論的這些缺陷，行動者網路理論正好可以補足。比澤蘭 (Buzelin, 2005, p. 215) 從翻譯研究所需理論工具的角度，看到這兩種社會學理論的互補性，稱它們為「意外的盟友」(unexpected allies)。Bogic (2010, p. 180) 也認為，行動者網路理論的引入，將使翻譯研究者更加關注翻譯生產過程，並重新界定翻譯行為人 (translating agent)，把各種行動者考慮進去。有鑒於此，本文嘗試應用場域理論和行動者網路理論中互補的那部分內容，通過「細宏觀分析法」(meso-macro analysis) (Buzelin, 2013, p. 190)，利用搜集到的文獻資料，包括作者和譯者的自述、訪談、《紅高粱》英譯本封頁設計、出版說明、書籍資訊、媒體及學界評論等「副文本」(paratexts) (Genette, 1997, pp. 12, 344)、出版商資料、網路資源等，分析各種行動者如何透過資本轉化在場域內進行運作，以及如何構建一個行動者建網路來完成葛譯《紅高粱》在美國的生產及傳播。

參、《紅高粱》英譯本生產及傳播的社會學分析

中文文學有其特色和魅力，但是中文不是國際主流語言，中文文學想要進入世界文學版圖，必須透過翻譯。長期以來，西方學者慣於「用一種俯就的姿態」，以西方的文學標準衡量中文文學，那麼在歐美強勢文化裡，尤其在「對翻譯作品很懷疑」、不習慣看英譯書的美國（羅嶼，2008，頁121），中文文學英譯作品是如何生產、傳播的呢？本節從場域、譯者慣習、資本及行動者構建的網路入手，重點分析葛譯《紅高粱》在美國的生產及傳播過程，涉及的主要行動者有：（1）人類行動者，包括原作者莫言、譯者葛浩文、出版商維京企鵝、譚恩美、美國全國藝術基金會、書評人、譯作讀者；（2）非人類行動者，包括張藝謀電影《紅高粱》、小說《紅高粱》中英文文本。其中，莫言、葛浩文、維京企鵝、譚恩美、美國全國藝術基金會、《紅高粱》中文文本構成前期網路，直接參與譯本生產過程，而前期網路又可分為翻譯前初始網路和翻譯後出版網路。葛浩文、維京企鵝、電影《紅高粱》、《紅高粱》中英文文本、書評人、譯本讀者構成後期網路，直接參與《紅高粱》的傳播與接受。

一、生產過程分析

中文文學向英語世界的傳播，有源語文化 (source culture) 輸出和目標語文化 (target culture) 輸入兩個管道。前者一般獲國家機構資助，如大陸的外文出版社從20世紀50年代初迄今有計劃的文學譯介活動。由於外文社的許多譯作語言不夠通順可讀，且圖書流通發行管道不暢，讀者面小，傳播效果並不理想（參見鄭曄，2012）。後者通常由外籍譯者（多為漢學家）或海外華裔學者（如《西遊記》譯者余國藩）發起，由英美出版機構啟動的較少見。⁶ 因此，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的文學輸出，一

⁶ Wimmer (2001, p. 71) 指出，歐洲市場對翻譯有一種「飢渴感」(hunger for translation)，而美國的外語英譯書市卻一向「低迷」(translation blues)，這或許是因為文化霸權主義和唯我為上意識 (solipsism) 流行，美國人「普遍抵制英譯作品」，因此英美商業出版社在出版英譯書時「十分小心」。

般透過輸入國譯者主導網路 (translator-led network) 和輸出國機構資助網路 (subvention network) (又如在臺灣的國立編譯館) (Kung, 2009, pp. 127-128)。⁷ 葛浩文英譯《紅高粱》計畫事先並無機構資助或他人邀約，因而依託的是譯者主導網路。⁸

(一) 翻譯前初始網路的構建與運作

根據行動者網路理論，網路中各行動者地位平等，但是須有一個行動者去招募其他行動者，以形成交互關係網路，該行動者正是慣於自主選擇文本進行翻譯的葛浩文。在一次訪談中，葛浩文表示，他在翻譯選材時考慮兩個因素，一是他自己喜歡，二是友人推薦，但是重要的是作品「能引起他的興趣」（轉引自Kung, 2009, p. 128）。有關《紅高粱》翻譯的緣起，葛浩文回憶道：

我有一個在香港科技大學的朋友，有一年，他給我寄了一份刊物，登著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說這是應該注意的。⁹ 我就開始看，我很驚訝，莫言能有這樣的熱情來寫這樣一部小說，其中既有恨，又有愛。我說我一定要翻。我就寫信轉給莫言。莫言回信說他很高興我能翻譯他的著作。後來，我到了臺北，有一天在朋友家休息。我問他，有什麼好書嗎？他說有一個大陸作家

⁷ Kung (2009, p. 128) 認為：在輸入國譯者主導網路中，「譯者在沒有源語文化其他行動者參與、支援的情況下發起一個翻譯計畫。」這顯然把問題簡單化了。其一：排除了原作者及原出版商參與和支持翻譯計畫的可能性；其二：把ANT所稱「行動者」片面理解為人類行動者。

⁸ 葛浩文有時也依託輸出國機構資助網路。例如，1997年，臺灣蔣經國基金會開始資助「臺灣現代文學英譯系列」翻譯出版計畫，並委託王德威主持。葛浩文接受王德威的邀請，譯成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Rose, Rose, I Love You*,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1998)，後又與林麗君合譯朱天文的《荒人手記》(*Notes of a Desolate Man*,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1999) (參Kung, 2009, pp. 129-131; 徐菊清, 2013)。

⁹ 據劉紹銘 (2013)，此人是葛浩文的「老朋友」、香港學者鄭樹森教授。

寫的書叫《紅高粱》。我拿來看了起來，沒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決定《天堂蒜薹之歌》暫時放棄，先翻這部作品。這絕對是一個突破。我馬上跟莫言說：「《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這本書恐怕更值得我做。」（參見河西，2008）¹⁰

葛浩文的以上自述得到莫言的證實。據莫言回憶，葛浩文於1988年首次寫信給他，自稱是「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的研究生」，請求翻譯《天堂蒜薹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初版）。莫言當時的反應是「有人把自己的書翻譯成外文，那是很高興的事情，根本就考慮不到我要拿版稅呀！」於是就同意了。後來，葛浩文決定先翻《紅高粱》，再譯《天堂蒜薹之歌》，莫言自然沒有異議（莫言、王堯，2003，頁234-236）。從ANT角度看，鄭樹森、葛浩文的臺北朋友、葛浩文、柳無忌（柳亞子）、《紅高粱》中文文本和莫言，這些行動者透過資本的轉化相互聯結，構成翻譯前初始網路。該網路大致是這樣運作的：鄭樹森的推薦使葛浩文再次熱切關注莫言小說，這是人際關係即社會資本運作的結果；葛浩文本來已經被莫言小說「深深打動」，此次「既有恨，又有愛」的《天堂蒜薹之歌》作為非人類行動者被鄭樹森招募到網路中，引起葛氏強烈的翻譯欲望；葛氏欲翻譯，須取得翻譯版權，而當時的葛浩文對於莫言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是他利用與柳無忌的師生關係（社會資本），將柳亞子招募進來，賦予自身足夠的符號資本，令莫言爽快答應他的請求；¹¹ 另一個初始行動者臺北朋友的推薦，使葛氏的

¹⁰ 在一次訪談中，葛浩文（參見Sparks, 2013）表示，他初次讀到莫言的一篇「深深打動他的」（deeply affecting）小說（據查為《爆炸》）是在1987年，當時他在中國東北從事研究工作。此後不久，葛氏遇到一位朋友，此人跟五六位中國年輕作家簽了約，其中包括莫言，打算為他們每人出一本英譯小說集。葛浩文覺得該計畫「不切實際」，說服對方「放過莫言」給他。由此可知，葛浩文與莫言結緣早於他讀《天堂蒜薹之歌》。

¹¹ 柳亞子（1887-1958），江蘇吳江人，近代中國著名詩人，革命文學社團南社（1909-1923）主要發起人，以早期和毛澤東詩詞唱和聞名（Finz, 2002）。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柳亞子在大陸的文學名聲和社會地位，賦予他足夠的符號資本，莫言也許不認識柳無忌，但柳亞子的間接介入，使翻譯發起網路得以順利運作。

興趣轉向「好書」《紅高粱》，而此時的莫言及其小說（「這絕對是一個突破」）在葛浩文心目中積累了充足的符號資本。這些行動者借助各自的非經濟資本，交互聯結構成一個初始網路，促使葛浩文決定先行翻譯《紅高粱》。

（二）葛氏譯者慣習的形成及其介入文學場域

作為《紅高粱》英譯計畫發起人兼譯者，葛浩文在譯本生產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小節略述葛氏譯者慣習的形成及其如何成功介入文學場域。葛浩文1939年出生於美國加州，在「不怎麼樣的」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讀大學，但是不愛讀書，對中文也毫無興趣，「差點畢不了業」。1962年，葛浩文參加美國海軍，被派到臺灣當通訊官，後來調到日本，眼看就要前往越南參戰的他意識到「不能就這麼斷送了年輕的生命」，於是申請返回臺灣。這次他「猛然醒悟了，令人生方向轉了個個兒」。因為喜歡中文和中國文化，他請一個撤退到臺灣的東北人上門教他中文，「發現自己頗有學習中文的天分」，於是開始形成中文慣習。兩年後，葛浩文退伍，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中文，進一步強化其中文慣習，後因父親病危提前結束「留學」生涯。回國後不久，葛浩文進舊金山州立學院，師從美籍華裔學者許芥昱 (Kai-yu Hsu) 讀中文研究生，首次接觸到蕭軍、蕭紅的名字，於是其中國現代文學慣習逐漸形成。1971年碩士畢業後，他意識到自己「除了中文什麼都不會」，經許芥昱推薦，於次年進印地安那大學，師從另一位華裔學者柳無忌攻讀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得以進一步強化其中國現代文學慣習。1974年，葛氏完成評述蕭紅生平及作品的畢業論文，獲博士學位。經夏志清推薦，兩年後該論文在美國正式出版。¹²

¹² 書名為 *Hsiao Hung* (Woodbridge, CT: Twayne Publishers, 1976)。中譯本《蕭紅評傳》1979年、1980年在香港、臺灣先後出版。本段有關葛浩文個人資料引自賦格、張健（2008）和Stalling (2014, pp. 1-3)。

《蕭紅評傳》的問世，令幾乎被遺忘的才女蕭紅迅速受到國內外中文學界關注，被美國學者陸敬思（Lupke，2013，頁61）譽為「達到學術頂峰」的「創新精髓之作」。這意味著葛氏憑藉首部學術專著，順利進入文學場域，並開始積累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與此同時，其基於中文和中國現代文學慣習的譯者慣習也初步形成。因撰寫博士論文之需，葛氏初試「譯」刀，翻譯了蕭紅、蕭軍的若干作品。「那是我第一次做翻譯，儘管譯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真的喜歡做翻譯。」多年後葛氏回憶道（Lingenfelter, 2007）。《蕭紅評傳》出版後，葛浩文的興趣逐漸轉向翻譯，緊接著出版的幾部譯作強化了他的譯者慣習，其翻譯選材取向、翻譯策略和翻譯觀日益成熟。¹³ 1979年，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葛浩文翻譯的蕭紅名作《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其高超譯筆獲英美漢學界一致好評。卜立德（Pollard, 1981, p. 410）認為：葛譯《呼蘭河傳》「不僅準確，而且有時讀來令人愉悅，是英語美文的典範。」¹⁴ 胡志德（Huters, 1981, p. 190）指出：「葛譯品質令人欽佩，清楚準確，大體上捕捉住了原作的感覺。」，「有幾處，尤其是作品開頭處，英文讀起來好過原文。」¹⁵ 可以推想，憑藉英譯蕭紅小說的成功，葛氏在文學場域爭鬥中勝出，開始積累其作為譯者的符號資本，並繼續擴大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為此後成功聯結到商業出版網路奠定了堅實基礎。¹⁶ 果不其然，葛氏逐漸累積的非經濟資本幫助他招募到了一家商業出版社：有

¹³ 鄒佳（Yan, 2013：ix）指出，葛氏的學術興趣和文學偏好驅使他選擇嚴肅文學作品（尤其現代小說）。關於葛氏翻譯策略，可見本文「翻譯策略和風格例析」一節。其翻譯觀可歸納為：英文讀者為中心，力避字面翻譯，忠實與創造兼顧（參Sparks, 2013）。

¹⁴ 英文原文：“Indeed, it is not only accurate, but positively pleases at times as an example of good writing in English.”

¹⁵ 英文原文：“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is admirable; it is clear, accurate and for the most part captures the feel of the original. [...] at several points, particularly toward the beginning, the English version reads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¹⁶ 葛氏指出，雖然大學出版社出的書可以作為教材持續銷售，但是其固有缺點是「不管作品多麼好，銷路總是一般，因為（大學出版社）沒什麼錢做廣告。」（參見李進，2009，頁51）

一天，美國Grove出版社電話約請他翻譯大陸女作家張潔的代表作《沉重的翅膀》(*Heavy Wings*)。這本厚達308頁的翻譯書於1989年推出，是葛譯首次成功的商業出版，¹⁷ 令葛浩文信心大增，下定決心走翻譯之路(Lingenfelter, 2007)，從此全面介入翻譯場域。

(三) 翻譯出版網路的構建

ANT理論認為，一個行動者無論多強，也不可能獨自完成一項行動，而是需要從網路中其他行動者那裡獲得能量，共同完成該項行動。由於盈利至上的英美商業出版社對出版英譯書極為謹慎，中文文學英譯圖書想要進入美國市場，翻譯計畫發起人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是招募出版商，即獲取出版網路運作不可缺少的經濟資本。《紅高粱》英譯本出版之前，身為漢學家、翻譯家的葛浩文已在文學場域獲取充足的非經濟資本，因此能成功招募到商業出版商。具體分析如下：

《紅高粱》英譯計畫啟動前，葛氏翻譯或與人合譯的蕭紅、陳若曦等人譯作經由學術出版社出版，張潔、李昂等人譯作透過商業出版社出版，¹⁸ 獲評論界不同程度肯定、讚揚，進一步提升葛氏在文學場域的地位和信譽（符號資本），擴大其文化資本，也使他與美國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合作關係（社會資本）。因此，除了把小說翻譯好，他只須招募到出版社的經濟資本即可出版譯作。獲莫言同意後，葛浩文立即著手翻譯了小說第一章「紅高粱」前八節，即譯到「我奶奶」被日軍機槍射

¹⁷ 美國權威書評雜誌《出版週刊》(*Publishers Weekly*) 指出，「張潔的這部小說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不久文學領域的一大突破……曾獲代表中國文壇最高榮譽的茅盾文學獎，葛浩文高超的譯筆為原作增光添彩。」(Goldblatt's superb translation does credit to this work)。參見亞馬遜網頁：<http://www.amazon.com/Heavy-Wings-Jie-Zhang/dp/0802110398>。

¹⁸ 陳若曦小說集《尹縣長》由殷張蘭熙(Nancy Ing)與葛浩文合譯，題作*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1979年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李昂中篇小說《殺夫》由葛浩文與Ellen Yeung合譯，題作*The Butcher's Wife: A Novel*，1986年舊金山北點出版社(North Point Press)出版。

中倒在血泊中，與電影《紅高粱》極具視覺衝擊力的結尾相呼應。葛浩文把譯稿投給致力於出版「具有恆久價值的優秀小說」的美國著名出版商維京企鵝圖書公司 (Viking Penguin)。¹⁹ 維京看出《紅高粱》的文學價值，同時也因1988年春張藝謀同名電影在美國大受歡迎和好評，充分意識到小說的商業出版價值，當即打電話給葛浩文：「這篇小說我們要了！」，並開出一個誘人的好價錢。就在那時，葛浩文好友、美籍華裔作家譚恩美 (Amy Tan) 被招募到出版網路中，她把自己的經紀人桑德拉 (Sandra Dijkstra) 介紹給葛浩文。桑德拉代表葛浩文與維京洽談，為葛氏爭取到比原價高四倍的版稅（參見賦格、張健，2008）。從她們在《紅高粱》出版網路中的作用看，譚恩美和桑德拉相當於文學代理人 (literary agent) (Buzelin, 2005, p. 209)。可以推想，葛浩文主要依靠個人充足的非經濟資本和電影《紅高粱》的符號資本，成功招募到出版商，獲取至關重要的經濟資本。與此同時，他藉助自己的社會資本把譚恩美招進網路，譚又招募到桑德拉，二人幫助葛浩文從維京出版社獲取更大的經濟資本，以便他能全身心投入翻譯，譯出精品。此後不久，葛浩文再次利用自身的非經濟資本，獲得美國全國藝術基金會的資助，為翻譯出版計畫爭取到又一份重要的經濟資本。²⁰ 至此，在葛氏發起、主導之下，透過人類、非人類行動者的合作互動，《紅高粱》英譯本出版網路已順利構建，只等葛浩文交齊譯稿，即可進入書稿編輯及出版發行環節。

¹⁹ 維京企鵝的前身是維京出版社 (Viking Press)，1925年創建於紐約，1975年被企鵝圖書公司英國分公司收購後更名。截至2006年，維京推出的作家中有五位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中四位在《紅高粱》出版前獲得），五位獲普立茲小說獎 (The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多人獲其他圖書類獎項。維京在美國乃至國際書市的影響力和崇高聲譽可見一斑。參見企鵝官網：<http://www.us.penguin.com/static/pages/publishers/adult/viking.html>。

²⁰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成立於1965年，是隸屬於美國國會的一個獨立機構，旨在資助使個人或社會受益的傑出藝術、創意及各種藝術創新。關於《紅高粱》英譯計畫受該基金會資助，參見企鵝版 (1994) 版權頁上「譯者註」(Translator's note)。

(四) 翻譯與編輯出版過程略述

《紅高粱》翻譯與編輯出版是重要生產環節之一，本該詳述。遺憾的是，編輯出版者一般對業務內情諱莫如深，而葛氏又很少透露翻譯過程詳情，此處僅就手頭資料略述一二。其一：翻譯過程。葛氏慣於在熟讀原作、研究作者和作品後才謹慎下筆翻譯。如理解原文有困難，他會直接向作者請教。在一次訪談中，葛氏表示，翻譯《紅高粱》期間，他與莫言的通信「達到高潮」(Orbach, 2012)。遇有疑難，葛氏還「偶爾求助」於劉紹銘 (Joseph S. M. Lau)、孔海立、朱志瑜等熟人或朋友。²¹ 譯者與作者的密切合作還影響到翻譯的其他方面：應莫言請求，葛氏依據的原文不是有刪減的大陸1987年版，而是完整的臺灣洪範1988年版；獲作者同意，葛氏翻譯時對原文作了一些刪減（同上註）。由於中英文之間不存在語義和語法對等，葛浩文重視的是「充分複製原文語句的意義和語氣」，而不是簡單的字面翻譯 (Goldblatt, 2000a, p. 23)，這使其譯文流暢可讀。葛氏還注重再現原文的敘事語域 (narrative register)，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小說人物所說的或莊重或俚俗的話；對於《紅高粱》中的山東方言語詞（如猥褻語），葛氏也認真處理，導致翻譯速度減慢。他的辦法是，找一個能表達相近意思的合適的俚俗英文詞、方言詞或稍顯古雅的英文詞 (Stalling, 2014, pp. 6-8)。其二：編輯的干預。葛浩文時常遇到一件令他「有點發瘋」的事，即譯稿編輯總想隨意刪減中文小說。《紅高粱》被編輯砍得最狠的是原文第四章「高粱殞」10頁左右的文字 (Yan, 2013, p. 155)。據葛浩文透露，維京出版社編輯發覺第四章部分內容「令人不安、冗餘、累贅」，問譯者可否刪除。葛氏表示「我再看看」，然後去問莫言，莫言的答覆是「沒問題」。葛氏表示，譯者或編輯都應關注文本完整性，不宜大幅度改變原文的敘事結構，或大量刪減、改寫原文，即便那樣做「往往會使原文變得更好」(Goldblatt, 2000a, p. 25)。

²¹ 見英譯本版權頁上「譯者註」。

二、傳播與接受過程分析

(一) 翻譯策略和風格例析

因譯本面貌會直接影響其傳播和接受效果，本小節對《紅高粱》英譯策略和風格略加分析。鄢佳 (Yan, 2013) 指出，葛氏翻譯《紅高粱》時大體上遵循「讀者、目的語和改寫原則」，採取「易化策略」(simplification)，較多改寫原作，但是處理源語文化特色詞時「異化還是多於歸化」，且儘量再現原作的節奏、景色描寫和生動語言。茲舉一例加以分析：

ST: 奶奶剪完蝸蝸出籠，又剪了一隻梅花小鹿。它背上生出一枝紅梅花，昂首挺胸，在自由的天地裏，正在尋找著自己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美滿生活。

我奶奶一生「大行不拘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敢於反抗，敢於鬥爭，原是一以貫之。所謂人的性格發展，毫無疑問需要客觀條件促成，但如果沒有內在條件，任何客觀條件也是白搭。正像毛澤東主席說的：溫度可以使雞蛋變成雞子，但不能使石頭變成雞子。孔夫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我想都是一個道理。

我奶奶剪紙時的奇思妙想，充分說明了她原本就是一個女中豪傑，只有她才敢把梅花樹栽到鹿背上。每當我看到奶奶的剪紙時，敬佩之意就油然而生。我奶奶要是搞了文學這一行，會把一大群文學家踩出屎來。她就是造物主，她就是金口玉牙，她說蝸蝸出籠蝸蝸就出籠，她說鹿背上長樹鹿背上就長樹。（莫言，2007，頁116）

TT: After cutting out the uncaged katydid, Grandma fashioned a plum-blossomed deer. The deer, its head high and chest thrown out, has a plum tree growing from its back as it wanders in search of a happy life, free of care and worries, devoid of constraints.

Only Grandma would have had the audacity to place a plum tree on the back of a deer. Whenever I see one of Grandma's cutouts, my admiration for her surges anew. If she could have become a writer, she would have put many of her literary peers to shame. 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golden lips and jade teeth of genius. She said a katydid perched on top of its cage, and that's what it did; she said a plum tree grew from the back of a deer, and that's where it grew. (Mo Yan, 1994, p. 132)

上引三段文字夾敘夾議，借剪紙一事表現「我奶奶」的心靈手巧、大膽潑辣、追求自由，是緊接著揭幕的羅曼史的情節鋪墊，因此在小說中是重要的一幕。葛浩文在忠於原作基礎上，採取靈活變通譯法處理「忠實」與「創造性」之間的張力：

1. 刪除第二段。本段首句「我奶奶一生……原是一以貫之」採用敘事者視角，但是後面的議論突然換成作者視角，造成敘事風格混亂，且其內容與「我奶奶」性格刻畫關係不大，屬於離題之論。葛浩文砍掉整段文字，顯然是為譯文讀者著想。因「敢於反抗，敢於鬥爭」被刪，「女中豪傑」一句也只好刪除。
2. 省譯語義重複語句。上引第一段文字之前，作者寫道，「一個大膽新穎的構思，跳出了奶奶的腦海」，因此，第三段首句「我奶奶剪紙時的奇思妙想」屬於語義重複，被省譯。
3. 忠實再現生動語言。本例中四字成語全部被忠實翻譯，且譯文形神兼顧，如「昂首挺胸」譯作“its head high and chest thrown out”；「無憂

- 無慮、無拘無束」譯作“free of care and worries, devoid of constraints”。
4. 異化源語文化特色詞。「她就是金口玉牙」（仿擬「金口玉言」）典出中國封建時代皇帝所說的話，現泛指一旦出口就不可改變的話。葛氏譯作“*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golden lips and jade teeth of genius*”，努力保留其文化意蘊。
 5. 發揮譯者創造性。葛氏英文駕馭能力強，其譯文曉暢可讀自不待言，有時遇到原文晦澀或粗俗之處，則依據英語慣用法進行再創造。例如，「會把一大群文學家踩出屎來」（喻指自慚形穢）用詞不雅，且直譯成英語可能仍含混不清，因此葛氏捨棄形式，譯作“*she would have put many of her literary peers to shame*”。

以上分析表明，葛譯確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兼顧「忠實」（如上述3、4兩點）與「創造性」（第5點），時常採用「難免的折衷方案」（如1、2點），因而「可讀、易懂、有銷路」。²² 這種翻譯策略和風格特點無疑提升了葛譯的可讀性和適銷性，幫助《紅高粱》順利進入英美主流圖書商業傳播網路。

（二）傳播與接受過程

本小節分析《紅高粱》葛譯本透過行動者網路運作在美國的傳播及接受過程，主要行動者有葛浩文、維京企鵝、電影《紅高粱》、《紅高粱》中英文文本、書評人和英文讀者。²³

有關《紅高粱》英譯本銷售及傳播業績的準確資料，自然不易得到，但是從葛浩文和莫言回饋的資訊，我們可知大致情況。在美國，

²² “I love the tension between creativity and fidelity, even the inevitable compromises. [...] The satisfaction of knowing I’ve faithfully served two constituencies keeps me happily turning good, bad, and indifferent Chinese prose into readable, accessible, and — yes — even marketable English books.” (Goldblatt, 2002)

²³ 劉紹銘（2012）也認為：「由於譯者的名氣，原著作品的特色和出版社鼎力的推動三者配搭得宜，*Red Sorghum* 在1993年亮相時可說是英譯中國文學一大盛事。」

一本英譯書的銷量想要上萬，作品通常須有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水準 (Wimmer, 2001, p. 71)。1993年4月，維京出版葛譯《紅高粱》，首刷即一萬冊，除了看好張藝謀電影《紅高粱》可以拉動小說銷售，也足見出版商對莫言和葛浩文的信心。莫言表示，「據說」該書出版後美國評論界和讀者「反應很好」，「進入了美國國家圖書俱樂部暢銷書的排行榜，我估計這本書讓出版商賺了錢的。」（莫言、王堯，2003，頁236）2008年初，葛浩文查了銷售記錄，高興地發現《紅高粱》連續印行15年未絕版，而且「已經（累計）發行到兩萬冊左右」，因為大陸小說在美國賣到一萬冊「算是暢銷了」（參見河西，2008）。由此可見，《紅高粱》英譯本可說是中文文學國際傳播成功的範例。那麼，當年那個成功的傳播網路是如何構建並運作的呢？

首先，維京企鵝依靠自身良好聲譽（符號資本）、業務關係及市場號召力（社會資本）、圖書發行及行銷實力（經濟資本），招募到大批的圖書分銷商和讀者參與網路構建，成功行銷《紅高粱》，為莫言及其作品首次帶來國際聲譽。布迪厄 (Bourdieu, 2008, p. 123) 認為：「出版商握有保證圖書出版的非凡權力，能給予一個文本及其作者一種公共存在 (public existence) 及其蘊含的聲譽和認同。圖書出版這種『創造』行為通常包含奉獻 (consecration)，即出版商將自身的符號資本（如出版前言蘊含的符號資本）轉讓給作者」。布迪厄 (p. 130-131) 指出，出版商的符號資本可用以下指標衡量：悠久的歷史 (antiquity) 及公司所在地、編輯的聲望（構成累積符號資本）及諾貝爾文學獎（如該公司曾出版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外國作家的書，就既有經濟資本，又有符號資本）。鑒於公司背景（參見註19），20世紀90年代初維京無疑擁有雄厚的經濟資本和符號資本。維京的經濟資本直接作用於作者、譯者、編輯等行動者，可確保書籍翻譯出版的高品質，社會資本使它能夠招募大量機構（出版業同行、圖書經銷商、大學、圖書館等）加入圖書傳播網路，符號資本則使讀者相信維京圖書的價值和品質，樂意購買或閱讀它出版的

書籍。顯然，如果葛浩文招募的是一家大學出版社或實力稍弱的商業出版社，《紅高粱》很難有如此好的銷售業績。莫言深感慶幸地指出，《紅高粱》英譯本出版之時被劉紹銘教授譽為「英譯漢語小說的一大盛事」，是因為該書由一家大的出版社出版，「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商業運作」，「面對著最普通的大眾讀者推出來」，因此能進入西方「真正的圖書商業（流通）渠道」（莫言、王堯，2003，頁262-263）。

其次，出版商與葛浩文利用各自的資本招募的書評人參與構建《紅高粱》傳播網路，²⁴ 令該書迅速進入專家讀者和大眾讀者的視野，有效擴大了讀者群。書評人一般本著個人口味和評價標準，對書的內容、風格和價值進行評價分析，透過個人在文學場域獲得的非經濟資本影響潛在讀者的購書或讀書決策。先看葛浩文方面，他的好友譚恩美這次以評論者身份加入後期網路，給予《紅高粱》很高的評價：「讀完《紅高粱》，我認為莫言應在世界文學殿堂占一席之地。他用的意象使人震驚、刺激感官、出自內心。他的史詩般的故事令人震撼。……我相信這本書將成功逾越許多翻譯書面臨的國際邊界。」；「莫言的聲音將進入美國讀者的心靈，就像當年的昆德拉和賈西亞·馬奎斯一樣。」²⁵ 譚恩美1989年以英文小說《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在美國文學場域嶄露頭角，1991年出版的《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 榮登美國最佳暢銷書榜首，再次引起轟動。作為小說家的她給予《紅高粱》熱情評價，

²⁴ 此處所謂「招募」，不是指維京或葛浩文出錢請人撰寫書評，而是指維京、葛浩文的資本以及書的自身價值能自動招募書評人。葛浩文透露，在美國，出版商會把新出的書送給媒體，但是評論與否由媒體自行決定，「你絕對不能去拉什麼關係，一拉關係就死了，（書）就完全封殺掉了。」（參見季進，2009，頁50）

²⁵ 英文原文：“Having read *Red Sorghum*, I believe Mo Yan deserves a place in world literature. His imagery is astounding, sensual and visceral. His story is electrifying and epic. [...] I am convinced this book will successfully leap over the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that many translated works face.” (See “Spectacular reviews for *Red Sorghum*,” in *Red Sorghum*, Penguin, 1994). “Mo Yan’s voice will find its way into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reader, just as Kundera and García Márquez have.” (See back cover in *Red Sorghum*, Penguin, 1994).

預測莫言在美國受歡迎的程度將比肩哥倫比亞作家、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對美國讀者自然有很大的號召力。葛浩文的另一好友、著名學者劉紹銘此前被招募為中期行動者，為翻譯時「偶爾向人求救」的葛浩文解答原文理解難題，²⁶ 此次又被招募為後期行動者，在中國作協主辦的《作家》雜誌上發表文章，及時介紹《紅高粱》英譯本出版及美國評論界的好評（劉紹銘，1993），不僅提升了莫言在國內的文學地位，而且有助於推動英譯本在國內的銷售。²⁷

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認為，文學研究者及譯者在權力場域中處於被支配地位，這意味著葛浩文的個人資本終究有限，《紅高粱》的傳播主力自然是出版商。維京企鵝憑藉自身強大的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招募一些有影響的美國媒體和書評人，「幾乎一致交口稱譽」《紅高粱》（劉紹銘，2012），為後期網路的構建及小說的銷售做出貢獻。例如，Stabiner (1993) 在《洛杉磯時報》發表短評指出：「作者的行文活潑有生氣，抒情段落和奇妙的口語文體交替運用。閱讀這部歷史小說，使人仿佛覺得親歷其境，其涉及範圍之廣令人印象深刻。」²⁸ 《里士滿時報快訊》(1993) 評論道：「一部精湛的譯作。……《紅高粱》的問世是英語文學一大盛事，預示著中文小說在21世紀將擁有非凡力量和影響。」²⁹ 《紐約雜誌》書評人Koenig (1993) 以〈野蠻的典雅〉為題，認為《紅高粱》是「莫言關於二三十年代中國的一部既野蠻又優美的小說」，其

²⁶ 同註21。

²⁷ 大陸外語學習及翻譯研究隊伍龐大，有閱讀、研究本國文學作品外語譯本的傳統。因此，劉紹銘向國內讀者及時傳遞《紅高粱》英譯本出版資訊，有助於該書的引進和銷售。

²⁸ 英文原文：“The author’s style is vibrant, alternating between lyrical passages and an oddly conversational tone. This historical tale has a remarkable sense of immediacy and an impressive scope.”

²⁹ 英文原文：“A masterful translation... The appearance of *Red Sorghum* is an important event for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one which bids well for the power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fi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See “Spectacular reviews for *Red Sorghum*,” in *Red Sorghum*, Penguin, 1994).

「殘酷敘事」可說是「殘酷到不留情面」；「書中許多意象獨具匠心，扣人心弦，儘管不少場面是暴戾的、血淋淋的。」³⁰ Hampton (1993) 在《紐約時報書評》中指出，莫言一向只在中國文藝界有名，外界對他知之甚少，此次維京出版他的小說《紅高粱》英譯本，有雙重收穫：「一是幫助英文讀者瞭解一個時代和一個地方，二是激發他們的想像力。」 Hampton認為：「作者發自內心的寫作散發出火藥、鮮血和死亡的氣味，技法高超、滿懷深情地再現了故鄉的生活。」，「小說幾乎每一頁都書寫這個殘酷野蠻時代的恐怖和幽默，細緻入微，栩栩如生。」最後結論是：莫言筆下那些「土匪種」的角色形象「生動鮮明」，西方讀者透過他們可以瞭解中國鄉村的奇特文化，「他們和莫言一起把高密東北鄉穩穩放入世界文學的版圖。」³¹

以上幾則書評主要針對「想要瞭解中國」的大眾讀者，³² 美國漢學家金介甫發表在《今日世界文學》上的評論則旨在引起專家和專業讀者的關注。金介甫 (Kinkley, 1994) 開篇即擊節歎賞：「在迄今已英譯出版的20世紀中文小說中，《紅高粱》無疑最震撼人心，同時或許也是最好的。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文學初次『解凍』，預示著一個有希望的未來，但是此後十年卻不知為何迷失了。莫言遲到的《紅高粱》讓

³⁰ 英文原文：“Mo Yan’s brutal and beautiful novel of China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 but here Mo Yan spares us nothing, [...] He fixes our attention on a series of exquisite images, splashed with gore.”

³¹ 英文原文：“[...] the result can illuminate a time and place as it excites the imagination. Mo Yan, a Chinese writer largely unknown outside the circles of Beijing’s literati, achieves both in *Red Sorghum*, [...] brilliantly and fondly re-creates this life with visceral writing that reeks of gunpowder, blood and death. [...] On almost every page, the horror and humor of this brutal and barbarous time are brought to life in graphic detail. [...] Mo Yan introduces Western readers to the unfamiliar culture of provincial China through dozens of vivid characters – like Five Monkeys Shan, Spotted Neck, Pocky Leng and Nine Dreams Cao. By the end, they and Mo Yan have put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securely on the map of world literature.”

³² 葛浩文 (Goldblatt, 2000b, pp. 327-328) 指出，因作品性質所致，或因為西方人大多對中國文化極為隔膜，英譯中文文學吸引的主要是那些「想要瞭解中國」的西方讀者，因此，大多數西方書評人和讀者閱讀英譯中文小說時「抱有預先確定的、很可能是非文學的動機。」

人看到中國文學的希望。」³³ 金介甫緊接著分析作品的母題、特點及敘事手法：

莫言是一位敢於探索實驗的年輕作家，《紅高粱》走的是現代主義之路，將一個主情節的過去和現在的片段與若干次情節融入宏大敘事中，其敘事有些許神秘色彩，但是電影動感和畫面感十足，有經典懸疑成分。……《紅高粱》將傳奇故事上升到神話，在現代中文小說中可謂獨樹一幟，儘管作者將「孝」與「愛國主義」這兩個民族神話完全顛覆。……小說運用的「魔幻現實主義」不僅彰顯於情節中，也見之於對高粱的魔幻化描寫。……在想像力出眾的莫言手中，即便是熟悉的英雄母題也可以變成荒誕，在這方面《紅高粱》開了中文小說的先河。

金介甫的結論是：「這部小說將因其藝術創新、神話的編造、英雄主義與反英雄主義、暴力及荒誕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再次，小說中英文本和電影《紅高粱》這三個非人類行動者對於銷售網路構建極為關鍵。綜合以上評論家觀點，原著的題材（二、三〇年代中國鄉村的野蠻、浪漫、暴力、血腥）、敘事手法（宏大敘事、殘酷敘事、傳奇故事的神話化、魔幻現實主義）及大量匠心獨運的意象，不僅有助於西方讀者瞭解中國歷史和文化，而且能夠激發他們的想像力。換言之，小說的內容和形式有吸引力，想要瞭解中國的西方讀者會忍不住一睹為快。顯然，英譯本雖然穿上了洋裝，但是衣服裏面的軀體才是真正能夠吸引讀者的，否則，《紅高粱》的英文「包裝」再精美，其西

³³ 英文原文：“*Red Sorghum* may be the best – surely it is the most startling –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novel yet to appear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elatedly it fulfills the promise that seemed to loom in Chinese literature’s future when it first ‘thawed out’ in the late 1970s but somehow got lost in the decade after.”

方之旅也不會那麼成功，由此可見原著在《紅高粱》英譯本傳播網路中的作用。當然，《紅高粱》得以旅行到美國，仰賴慧眼獨具的葛浩文的發掘，也就是說，原著這個非人類行動者透過人類行動者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為原著增光添彩的英譯也不容忽視。且看書評人對葛譯的片言隻語之評：「譯筆精湛」(masterful translation)（《里士滿時報快訊》）；「清楚有效的譯文」(sharp and effective translation) (Koenig, 1993)；「活潑有生氣的譯文」(vibrant translation) (Hampton, 1993)；「靈動的翻譯」(inspired translation) (Kinkley, 1994)。這些正面譯評的背後仍是網路和資本的運作：評論者透過自身的文化資本（專業知識和職業身份）和符號資本（在文學場域享有的地位和聲譽），借助報章雜誌的經濟資本和符號資本，把英譯本這個非人類行動者招募進來，使其在傳播網路運作中發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譯評僅表達書評人閱讀譯文的愉悅感，卻隻字不提葛譯是否忠於原著，這固然是因為許多評論人不諳中文（漢學家金介甫自然是例外），無從比較中英文本，但是評者對葛氏譯文風格的積極評價，無疑賦予譯本符號資本，有助於《紅高粱》的銷售。

電影《紅高粱》是又一個重要的非人類行動者。1988年春，張藝謀執導、改編自莫言同名小說的電影《紅高粱》進入西方電影市場，「吸引了歐洲觀眾的浪漫想像，上映之處大獲成功。」(Cohen, 1989)，莫言的名字開始為美國人所知 (Brody, 2012)。隨後該片連獲殊榮：1988年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第35屆雪梨國際電影節「電影評論獎」，1989年法國第5屆蒙彼利埃國際電影節「銀熊貓獎」，1990年民主德國電影家協會年度提名獎，等等。³⁴「沾電影之光」的莫言及《紅高粱》開始享有國際聲譽，逐漸累積符號資本。前文已提及電影《紅高粱》的符號資本參與翻譯出版網路的構建，而它對於小說傳播網路的

³⁴ 參見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9%AB%98%E7%B2%B1>。

拓展更是功不可沒。其一：書評人巧借電影之力推介小說。筆者所見《紅高粱》英譯本書評無一例外提到張藝謀同名電影，例如「你們看過電影，現在讀原著吧！」(Stabiner, 1993)，讀來就像一則圖書廣告；「《紅高粱》是莫言五部中篇小說的合集，張藝謀備受讚譽的首部電影即改編自其中的〈紅高粱〉和〈高粱酒〉(Hampton, 1993)；「儘管這是即將譯成英文的莫言第一部小說，許多美國人透過電影《紅高粱》已經知道這個作品。」(Perushek, 1993)；「小說講述的故事已透過同名電影為很多美國人所熟知，……經由葛浩文靈動翻譯的《紅高粱》，比根據小說改編的那部愛國主義電影有趣何止百倍。」(Kinkley, 1994)。其二：企鵝版裝幀做足電影的文章。從封底可知，《紅高粱》企鵝版(1994)封面設計者為Gail Belenson，封面照片採用「張藝謀電影《紅高粱》劇照」(Film stills from *Red Sorghum* by Zhang Yimou)。封面均勻分成兩半，上半截為電影畫面截圖，下半截為文字。畫面居中用黑框圈起(代表電影特寫)的是女主角鞏俐片中劇照，背景是幾個粗獷漢子抬著一頂大紅花轎，在沙塵翻滾的黃土路上顛簸行進。這個有視覺衝擊力的畫面，讓人感覺「中華特性」(Chineseness)撲面而來，看過電影的美國人會再次感到震撼。封面下半截的文字也緊緊圍繞電影影像而設計：書名「RED SORGHUM」採用紅色醒目大寫字，與上頭的大紅花轎配搭相宜；作者名「MO YAN」則採用黑體大寫字體，既暗示這是一位冷靜反思歷史的作家，也讓人聯想到電影結束部分鋪滿銀幕的血紅色中那個黑色的太陽。如此引人注目的封面設計，幾年前看過電影者自不必說，但凡對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有興趣的美國人，都難抵制買書或讀書的誘惑。《紅高粱》出版商和書評人巧借電影的符號資本，有力拉動了小說銷售和傳播。相較之下，兩年後仍由維京鼎力推出的葛譯《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 1995)，儘管葛浩文認為「其中的愛與恨很能打動人」，卻「一直都賣不好」(季進，2009，頁47、51)。筆者認為，其中一大原因是這部小說缺了電影的助力。³⁵

³⁵ 電影推動中文小說在美國傳播的另一個例子是朱天文。葛浩文透露，《荒人手記》講同性戀問題，又是女作家寫的，美國人很好奇，但是朱天文在美國「有點地位」，「多少和侯孝賢導演有關」(參見羅巖，2008，頁120)。

最後，讀者是傳播及接受網路中重要的人類行動者，也是此前所有網路構建與運作努力的終極目的。中文文學英譯書的西方讀者主要有兩類：專家讀者（學者、研究者、大學教師等）和大眾讀者（學中文的大學生、社會人士），他們的共同點是對中國有興趣，想更多瞭解中國。讀者被招募為行動者並參與傳播網路運作的過程大致如此：首先，潛在讀者被維京企鵝的經濟資本和符號資本打動，產生初步購書或讀書意向；接著，看過電影《紅高粱》的人被其符號資本招募，讀過書評的人則為評論人的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所招募，知道葛浩文或讀過其譯作的人則被葛氏的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招募，至於未看過電影、書評或讀過葛譯者，經某人或某機構推薦（透過社會資本的運作），也會產生購書或讀書興趣；然後，被上述某個或多個行動者招募的潛在讀者，透過自身的文化資本（接受的教育及從事的職業）和經濟資本（買書所需的錢或讀書所需的成本）參與到傳播網路中；最後，透過某個管道（書店、網上書店、圖書館、互聯網等）完成購買或閱讀《紅高粱》的任務。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批讀者透過購書及閱讀行動，能為作品積累符號資本，透過讀者口耳相傳，即利用社會資本能招募到更多購買者和讀者。換言之，讀者既是傳播網路的被招募者和參與者，也是招募人和拓展者。《紅高粱》銷售業績不俗，說明這是一個高效運作的行銷傳播網路，各種行動者利用自身資本把網路功用發揮到了極致。

肆、結論

透過本案例分析，得出以下幾點結論及啟示：

第一，在場域理論與行動者網路理論觀照下，翻譯既是社會實踐，也是知識生產，是人類、非人類行動者透過在場域內轉化資本，構建並運作一個行動者網路，最後共同完成的一項任務。社會學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種分析譯本生產及傳播過程的合適的理論工具，既突破了傳統譯論追求譯文與原文對等 (equivalence) 的研究取向，也有助於糾正基

於多元系統論的幾種文化翻譯理論 (例如Toury, 1995; Lefevere, 1992) 的決定論 (determinism) 傾向。近十年異軍突起的翻譯社會學，不僅是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有益的補充，而且開闢了一個前途看好的研究領域。

第二，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輸出自身民族文學，一般透過輸入國譯者主導網路和輸出國機構資助網路運作。本研究表明，在輸入國譯者主導網路模式中，譯者可自主選擇原文進行翻譯，自行確定翻譯策略，但是譯本生產及傳播成功與否，除了原作及譯作須打動人、有銷路，還須招募原作者以便取得翻譯權，招募出版商以便獲得至關重要的出版管道，招募書評人以便引導讀者，招募讀者以便拓展傳播管道。要做到這些，不僅須依靠個體行動者的資本運作，更須某個行動者招募其他行動者帶著各自的資本參與網路構建，在網路運作中共同完成任務。本研究還發現，譯者主導模式下運作的網路可分為前期（翻譯出版）網路和後期（傳播）網路，前者又可分成翻譯前初始網路和翻譯後出版網路。譯者是前期網路的主要行動者即網路招募人，其資本儲備（一般體現為文化、社會、符號資本的總和）決定他們能否扮演好這個角色。出版商是後期網路的主要行動者即網路招募人，其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大體上決定譯作傳播的成敗。

第三，葛浩文學中文純屬機緣巧合，他的臺灣生活背景及語言天賦促成其中文慣習，讀中文研究生的學術背景促成其中國文學慣習，兩種慣習合力，加之他對中文翻譯的特殊興趣和天賦，終於形成其譯者慣習，並助他順利進入文學場域。葛氏的譯者慣習體現在翻譯選材（偏好嚴肅現代中文小說）、翻譯觀（讀者至上、服務市場）、翻譯策略（異化與歸化、忠實與創造兼顧）諸方面。這種慣習不僅幫助他在文學場域爭鬥中成功勝出，逐漸積累資本、獲取更大更多利益，而且幫助莫言《紅高粱》及後續作品經由其備受讚譽的譯作順利登陸美國，進入美國乃至世界文學場域，直至莫言的文化、社會和符號資本積累到足夠程度，發生質的飛躍，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葛浩文作為中文現代文學首席

翻譯家取得的成功，以及他幫助莫言獲得世界文學聲譽，給我們留下許多值得深思的話題、值得借鑒的經驗。

第四，葛浩文英譯《紅高粱》的成功，固然有賴所有行動者透過資本運作聯結而成的網路，但是翻譯出版網路的構建卻未必帶來英譯中文小說的成功（如《酒國》），³⁶ 我們須思考在譯者主導網路模式下哪些人類、非人類行動者會決定一部譯作生產及傳播的成敗。筆者認為，文學作品如同出口商品，必須在目標市場「適銷對路」才会有銷路，因此原文內在品質（題材內容和敘事手法）是第一位要素。顯然，《酒國》「賣不動」跟翻譯傳播脈絡運作關係不大，而是因為其內容較為隱晦，形式又很複雜，降低了美國讀者的閱讀興趣。葛浩文即指出，《酒國》是「書寫當代中國社會的最為複雜、敘事手法最精緻的小說之一」，其冷嘲熱諷的敘事者超然物外，不像《紅高粱》的敘事那樣能夠「強化讀者對故事的情感參與。」(Goldblatt, 2000c, pp. 481, 483) 其二：「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優秀作品須要沙裡淘金，因此「伯樂」的重要性不亞於原作品質。一般認為，西方漢學家腳踩中西文化，既熟悉中文文學，又瞭解海外讀者的閱讀需求，是遴選原作的最佳人選（胡安江，2010，頁11）。葛浩文暫時擱置《天堂蒜薹之歌》，先譯《紅高粱》，說明他慧眼獨具，但是《酒國》等作品的銷售記錄欠佳，又說明漢學家的翻譯選材確當與否受制於目標市場需求。³⁷ 可見，出版社在翻譯選材及做出版決定時除了考慮漢學家的意見，也須做充分的市場調查，以把握讀者口味。其三：資本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出版社是英譯中文小說的

³⁶ 《酒國》英譯本2000年由紐約Arcade出版社發行。葛浩文（參見Landreth, 2012）透露：「這本書寫作技巧高超，把一個複雜故事的四個分支串在一起，但是跟美國出版的很多翻譯書一樣，出版社就是賣不動它。」

³⁷ 葛浩文（參見季進，2009，頁46）指出，向美國讀者譯介中文小說，「重要的還是選擇（合適的作品）」，但是什麼樣的作品值得翻譯，他並無十足把握：「有時候我也納悶，我常常選擇我特別喜歡、認為老美非讀不可的作品來翻譯，可是他們未必那麼喜歡。其實美國人愛（讀）什麼，我也不知道」。

最佳出版商，但是招募這些出版商絕非易事，原作者、譯者的資本儲備乃至作品的符號資本是說服他們投資的要素。名家、名作、名譯、大出版社，無疑是中文文學作品在西方順利出版、有效傳播的保障，是中文文學得以在國際上發聲的重要途徑。其四：實踐證明，中文電影先行，進入海外市場，為作者及其作品掙得名聲（符號資本），贏得海外受眾，是中文文學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徑。由此可以推斷，輸出國電影界、文學界、翻譯界、出版界如能聯手實施「文化輸出」計畫，以電影出口拉動文學輸出，效果會好於一個精心構建的作品翻譯、出版與傳播網路。

最後，本文僅涉及輸入國譯者主導網路模式下各種行動者互動給英譯中文文學帶來的機遇及成功，不難看出，英譯《紅高粱》的成功，仰賴資本和行動者網路的運作特別順暢高效，包括維京被招募、電影《紅高粱》為小說鳴鑼開道這兩個重要環節。莫言是中文文學國際傳播的一個成功案例，給了我們頗多啟示。那些與他比肩的中文作家想在國際發聲，究竟該如何運作？本文做了一些思考，但是如此棘手的大問題，自然非拙文所能解決。值得指出的是，大陸和臺灣50餘年由國家機構贊助本國文學外譯的實踐成果顯示，雖然輸出國機構資助網路運作面臨諸多挑戰和問題（參見江帆，2007；耿強，2010；鄭曄，2012；徐菊清，2013），但是該模式為許多未受外國漢學家或出版商注意的中文作家提供了發聲機會，也算是功不可沒。至於如何提升該模式下英譯中文文學的傳播效用，則須另寫一篇論文做專題探討。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王志弘（2001）。翻譯的自我與他者問題。翻譯學研究集刊，6，1-25。
- 王蒙（2013年1月11日）。莫言獲獎十八條。光明日報，13版。
- 江帆（2007）。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復旦大學，上海市。
- 邢傑（2007）。譯者「思維習慣」——描述翻譯學研究新視角。中國翻譯，5，10-15。
- 何琳（2011）。翻譯家葛浩文與《中國文學》。時代文學，2，164-166。
- 呂敏宏（2011）。葛浩文小說翻譯敘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紅滿（2007）。布迪厄與翻譯社會學的理論建構。中國翻譯，5，6-9。
- 季進（2009）。我譯故我在——葛浩文訪談錄。當代作家評論，6，45-56。
- 武光軍（2008）。翻譯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外國語，1，75-82。
- 河西（2008年4月9日）。葛浩文與他的漢譯之旅。新民週刊。取自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09/115415321374.shtml>
- 邵璐（2011）。莫言小說英譯研究。中國比較文學，1，45-56。
- 侯羽、劉澤權、劉鼎甲（2014）。基於語料庫的葛浩文譯者風格分析。外語與外語教學，2，72-78。
- 胡安江（2010）。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為例。中國翻譯，6，10-16。
- 夏志清（1996）。序一。載於夏志清、孔海立（主編），大時代：端木蕻良四〇年代作品選（頁12-24）。臺北：立緒文化事業。

- 徐菊清（2013）。贊助對臺灣文學英譯的發展與傳介之影響。編譯論叢，6（1），1-32。
- 耿強（2010）。文學譯介與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熊貓叢書》英譯中國文學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市。
- 莫言（2007）。紅高粱家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莫言（2010）。莫言散文新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莫言、王堯（2003）。莫言王堯對話錄。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 許方、許鈞（2013）。翻譯與創作——許鈞教授談莫言獲獎及其作品的翻譯。小說評論，2，4-10。
- 陸志國（2013）。茅盾五四伊始的翻譯轉向：布迪厄的視角。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89-94。
- 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週末（譯）（2013）。渴望至高無上——中國現代小說和葛浩文的聲音。粵海風，4，61-64。
- 劉紹銘（1993）。入了世界文學的版圖——莫言著作、葛浩文譯文印象及其他。作家，8，505-511。
- 劉紹銘（2012年12月20日）。野蠻的典雅。時代週報。取自<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12-20/128337.html>
- 劉紹銘（2013年5月12日）。情難自己。東方早報，B12版。取自<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5/12/994951.shtml>
- 賦格、張健（2008年3月27日）。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南方週末，D21版。
- 鄭延國（2012年11月11日）。葛浩文功德無量。大公報（香港）。取自http://www.takungpao.com.hk/paper/content/2012-11/11/content_1370388.htm
- 鄭曄（2012）。國家機構贊助下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以英文版《中國文學》（1951-2000）為個案（未出版之博士論文）。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市。

羅嶼（2008）。葛浩文：美國人喜歡唱反調的作品。新世紀週刊，10，120-121。

英文文獻

- Bogic, A. (2010). Uncovering the hidden actors with the help of Latour: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Sex*. *MonTI*, 2, 173-192.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 A. S.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pp. 46-5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8). A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publis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1(2), 123-153.
- Brody, R. (2012, October 11). Mo Yan and the power of movies. *The New York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movies/2012/10/mo-yan-and-red-sorghum.html>
- Buzelin, H. (2005). Unexpected allies: How Latour’s network theory could complement Bourdieusian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or*, 11 (2), 193-218.
- Buzelin, H. (2007). Translations “in the making”. In M. Wolf & 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pp. 135-16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uzelin, H. (2013).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 Millán & F. Bartrin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86-200). London and

- New York: Routledge.
- Callon, M. (1999).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market test. In J. Law & J. Hassard (E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pp. 181-195). Oxford: Wiley-Blackwell.
- Cohen, J. L. (1989). A year for Asian films. *Provincetown Arts*, 5, 104.
- Crawford, C. S. (2005). Actor network theory. In G. Ritzer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Vol. 1, pp. 1-3).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Dong Y. (2013). A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 *Red Sorghum* under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hangchu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 Finz, S. (2002, October 18). Wu-chi Liu – Scholar and write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Wu-chi-Liu-scholar-and-writer-2783172.php>
- Genette, G.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Lewin, Jane E.,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blatt, H. (2000a). Of silk purses and sows' ears: Features and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the West. *Translation Review*, 59, 21-28.
- Goldblatt, H. (2000b). Border crossings: Chinese writing, in their world and ours. In T. B. Weston & L. M. Jenson (Eds.), *China beyond the headlines* (pp. 327-346).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Goldblatt, H. (2000c). The "saturnicon": Forbidden food of Mo Ya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4(3), 477-485.
- Goldblatt, H. (2002, April 28). The writing life. *The Washington Post*, p. 10 (Book World).
- Gouanvic, J.-M. (2002). A model of 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 Hermans (Ed.),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pp. 93-102). Manchester: St. Jerome.
- Hampton, W. (1993, April 18). Anarchy and plain bad luck [Review of *Red*

- sorghum* by Mo Ya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p. 28.
- Huters, T. (1981, Jan.). Hsiao Hung.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Review].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3 (1), 188-192.
- Kinkley, J. C. (1994, spring). World literature in review: China – [Review of *Red sorghum* by Mo Ya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8(2), 428.
- Koenig, R. (1993, May 3). Savage grace [Review of *Red sorghum* by Mo Yan]. *New York Magazine*, p. 79.
- Kung, S. -W. C. (2009). Translation agents and network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novels. In A. Pym & A. Perekrestenko (Eds.), *Translation research projects 2* (pp. 123-138). Tarragona: Intercultural Studies Group.
- Landreth, J. (2012, October 12). Will Mo Yan's Nobel Prize finally mean better book sales abroad?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Retrieved from <http://asiasociety.org/blog/asia/will-mo-yans-nobel-prize-finally-mean-better-book-sales-abroad>
- Latour, B. (1999). On recalling ANT. In J. Law & J. Hassard (E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pp. 15-25). Oxford: Wiley-Blackwell.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w, J. (1987). Technology and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 The case of the Portuguese expansion. In W. E. Bijker, T. P. Hughes & T. J. Pinc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pp. 111-13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ingenfelter, A. (2007, summer). 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 life and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matters. *Full Tilt* 2. Retrieved from http://fulltilt.ncu.edu.tw/Content.asp?I_No=16&Period=2
- Mo Yan (1994). *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Goldblatt, H., Trans.). London/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urdoch, J. (1997). Inhuman/nonhuman/human: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nondualistic and symmetrical perspective on nature and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6), 731-756.
- Perushek, D. E. (1993, Mar. 15). *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Review]. *Library Journal*, 118(5), 108.
- Pollard, D. E. (1981). Hsiao Hung: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Review].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44(2), 409-410.
- Orbach, M. (2012, December 10). Mo Yan's Jewish interpreter. *Tablet*. Retrieved from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arts-and-culture/books/118673/mo-yan-jewish-interpreter?all=1>
- Simeoni, D. (1998).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Target*, 10 (1), 1-40.
- Sparks, S. (2013, May 26). Translating Mo Yan: An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Retrieved from <https://lareviewofbooks.org/interview/translating-mo-yan-an-interview-with-howard-goldblatt>
- Stabiner, K. (1993, September 12). In brief: Fiction [Review of *Red sorghum* by Mo Yan]. *Los Angeles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3-09-12/books/bk-34135_1_red-sorghum
- Stalling, J. (2014). The voice of the translator: An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ion Review*, 88, 1-12.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Wimmer, N. (2001, May 21). The U.S. translation blues. *Publishers Weekly*, 248(21), 71-74.

Wolf, M. (2010). Translation “going social”? Challenges to the (ivory) Tower of Babel. *MonTI*, 2, 29-46.

Yan, J. (2013). A study on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habitus from the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